

宁夏红寺堡生态移民区回族方言接触探析

张秋红¹, 杨占武²

(1. 北方民族大学 文史学院, 宁夏 银川 750021; 2. 宁夏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宁夏 银川 750001)

摘要:红寺堡是宁夏扶贫新区,在这里,操不同方言的百姓不断减少自己的母语方音、词汇,以使语言沟通顺畅,各种语言交融现象渐渐显现。语言接触导致语言不断发生融合、变化,从语言融合可以看出移民搬迁后对新居住地文化的心理认同。

关键词:红寺堡;移民方言;回族方言;语言接触

中图分类号:H1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6627(2016)01-0091-03

一、红寺堡移民语言状况

红寺堡开发区地处宁夏回族自治区中部,是宁夏一个重要的移民搬迁区。移民主要来自宁夏的海原、西吉、原州区、隆德、彭阳、泾源、同心、中宁8县。截至2014年,辖2镇3乡69个行政村,常住人口165 016人,其中回族人口总数为100 269人,占60.76%^[1]。移民搬迁和异地安置中,面临着移民的社会适应和社会融合,语言接触首当其冲。红寺堡原隶属同心县,老百姓多说同心话,现为吴忠市红寺堡移民开发区,搬迁的移民方言大概可分为兰银官话、中原官话两种^[2],从中原官话区到兰银官话区这一语言适应与语言融合是移民搬迁的一个关键环节。

不同方言间的沟通交流往往存在不同程度的语言障碍,移民搬迁到新环境,首先面临的是语言接触所带来的言语交际问题^[3]。不过,比起三峡移民不同方言间的接触,宁夏的生态移民语言适应要迅速得多,因为不管中原官话还是兰银官话,都属于北方方言系统,只是语言内部存在些许差异,持各自方言基本可以交流。

总体看来,红寺堡区方言呈大杂烩的特点,8县移民的方言各有特色。为了相互沟通交流,人们不断改变语言习惯,使原来在青海固地区使用的方言在逐渐融合变化中,词汇和音调发生了一些细微的变化。另外,尽管搬迁到红寺堡十多年,很多语言词汇依然保留在老年人的口语中,年轻人却已经不常说了,如“水[fi]”“曹(第一人称复数)”“岱哈(蹲下)”等。红寺堡方言变迁总体体现为以下几点。一是语音变迁,如语音不断向普通话靠近,独有的方言语音特色消失,说话语气由快转慢等。二是词汇的转换,为了使其他方言区的人能听懂自己的方言,各方言区百姓会把一些生涩、不易理解的词汇用其他通俗易懂、大家都能理解的词汇代替。如固原原州区搬迁来的居民将“火盖子”改说为“雪里红”,“蚍蜉马儿”改说为“蚂蚁”,“长虫”改说为“蛇”,“对羔子”改说为“双

收稿日期:2015-10-28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宁夏生态吊庄移民回族方言研究”(14CYY008)

作者简介:张秋红(1987-),女,福建龙岩人,北方民族大学文史学院讲师,主要从事回族方言研究;杨占武(1963-),男(回族),宁夏同心人,宁夏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研究员,博士,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回族语言文化研究。

胞胎”，“哼吼”改说为“猫头鹰”，“赶羊时”改说为“上午9点左右”，等等。再如西吉县搬迁的移民将原西吉方言“酣[ɲæn¹³]水”“滚水”改说为“开水”，“夜里个”改说为“昨天”，等等。三是心理认同的区别。同一方言区的人在平时交流时还是会使用原地区的方言，在和其他方言区的人交流时，却有意把晦涩难懂的词汇难度降低，使用普通话词汇。这些言语交际体现了移民对迁入地的融合。

二、红寺堡回族移民语言接触变化

红寺堡回族移民方言接触变化主要体现在词汇上，语音次之，语法较不明显。语法是语言中最稳定的部分，其变迁通常比语音、词汇要慢得多。搬迁到红寺堡区的百姓不过一二十年，其语法变迁还未形成，调查中记录到“这个人的礼貌好不好？”（意为“这个人有没有礼貌？”）等，其他语法变迁有待进一步调查。下面主要从词汇、语音方面针对移民搬迁前后方言接触、语言变异情况进行探讨。

（一）词汇方面

1. 亲属称谓词的变化。亲属称谓词的演变是红寺堡移民区回族方言变化最直接也是最明显的，如：“大”→“爸爸”，“老大”→“伯父”，“大大”→“叔父”，“巴巴”→“叔叔”，“嬷嬷”→“伯母”，“新妈”→“叔母”，“舅母”→“舅妈”，“外母娘”→“丈母娘”，“外父”→“丈人”（外父也同时存在），“掌柜的”→“丈夫”，“姨娘”→“姨姨”，“娘娘”→“姑姑”（汉族话为“姑娘”），“嫂嫂”→“嫂子”，“女子”→“女儿”，“弟妇子”→“弟媳妇”，等等。在亲属称谓中，较为特别的是红寺堡方言中夫妻双方的互称。当一对夫妻有了孩子后，他们会以变换语调的方式用第一个孩子的名字称呼对方，邻居也可用该夫妇第一个孩子的名字的变调来称呼这对夫妻。这种情况在搬迁前的方言中比较普遍，搬迁到红寺堡后只是个别情况。赵红芳认为，就固原宗亲系的称谓来说，回汉百姓都会将父亲称为“大”，但是回族话和汉族话存在声调的差异，且对自己父亲的兄或弟称谓存在差异。这一微妙的别同心理在于保持民族性，蕴含着回族人民复杂的民族心理与文化特质^[4]。当移民从老家搬迁到移民新区后，老百姓亲属称谓的变化更是凸显了移民对红寺堡地域文化的认同和心理归属。

2. 时间名词的演变。时间名词是日常生活中的常用词汇，从西海固等地搬迁来的移民为了融入当地语言文化生活，不断改变自身的母语习惯，例如：“夜里个”→“昨天”，“老后儿”→“大后天”，“外后儿”→“大大后天”，“前儿”→“前天”，“上前几个”→“大前天”，“一麻亮”→“清晨”，“天麻乎乎亮”→“天刚亮”，“赶羊时”→“九点”，“早起”→“上午”，“后晌”→“下午”，“麻糊子”→“黄昏”，“黑了”→“晚上”，“摸黑锅锅子”→“傍晚”，“年时”→“去年”，“往年”→“前几年”，等等，这些时间名词以兰银官话区常用说法为主，表现了老百姓自愿、主动的语言融入态度。

3. 外语借词的减少。红寺堡回族话与汉族话中，具有区别特色的主要是阿拉伯语借词和波斯语借词。至今，在回族移民日常口语中仍保留着如下词汇：“主麻（阿拉伯语借词，周五、聚礼）”“阿布代斯（波斯语借词，水浴净礼即小净）”“牙日（波斯语借词，伙伴）”“恕迷（波斯语借词，倒霉、不幸）”“冒提（阿拉伯语借词，死亡）”“代斯塔尔（波斯语借词，礼拜用缠头巾）”等等，这些与穆斯林生活密切相关的词汇，在回族百姓生活中依然较多地保留着。但随着经堂教育的弱化和义务教育的普及，搬迁后的回族百姓较少接受经堂教育，所以经堂语词汇较少出现在日常口语中，如“哈里（运气）”“法给尔（贫困）”“盖兰（笔）”“阿兰（宇宙、世界）”“敏拜尔（礼拜堂内讲演台）”等仅存在于清真寺教职人员的讲经里，除了宗教人士，回族百姓口中已经较少出现了。

4. 儿化词。泾源回族方言中的儿化词比同心回族话中的儿化词丰富得多，如“大拿儿”“榆钱儿”“涎水帘儿”“事儿”“一只儿”“眼儿”“鸡儿”“雀儿”“今儿”“明儿”“后儿”“前儿”“擦黑儿”等。此外，红寺堡回族方言中常出现重叠加儿化，如“小刀刀儿”“掐节节儿”“方格格儿”“热热儿”“瓶盖盖儿”“杏核核儿”“水豆豆儿”“壶嘴嘴儿”“水水儿”“小窗窗儿”“筐筐儿”“棍棍儿”“槌槌儿”“桶桶儿”“绒绒儿”“匀匀儿地”“裙裙儿”“穷穷儿”等。另外，三音节词儿化也较为明显，如“下羊羔儿”“光棍汉儿”“娃娃伙儿”等。经调查，回族话儿化词比汉族话儿化词要丰富，主要原因

在于回族话深受经堂语影响,而经堂语在翻译阿拉伯语、波斯语或借用阿拉伯语、波斯语借词时,对舌尖颤音[r]进行了儿化处理。

5. 特征词、量词的变迁。固原方言中特有的量词,如“一个鞋”“一个牛”“一个笔”“一页鞋”“一口猪”“一个鸡”等将随着语言的融合不断向兰银官话或普通话靠近。动物性别词,如“草狗(母狗)”“郎狗”“牙狗”“羯牛”“跑牛”“乳牛”“犍牛”“儿马(公马)”“骡马(母马)”“叫驴(公驴)”“草驴(母驴)”“羯羊(阉割过的羊)”“母猫”“郎猫(公猫)”“女[mi]猫”“骗鸡”“喧鸡(骗了的公鸡)”等在搬迁到红寺堡后基本一致,但由于红寺堡居住区蓄养牲畜不便,部分动物性别词的使用呈弱化趋势,且随着时间的推移,部分特征词、量词呈消亡趋势。

(二) 语音方面

语音是红寺堡人最能直观感受的语言变化,如声调的差异、说话语气的变化等。在原西海固地区,由于山高路远,人们平常说话语气重、音偏高,通俗地说就是嗓门大。到了红寺堡后,地处平原,居住相对比较集中,说话无须高声,人们说话语气变轻,声音变低,浊音清化,方言的语音特色渐渐消失。声母方面,西海固搬迁来的移民方言中较多出现声母混淆现象,如:“肚[t'u]子”“鸡蛋[t'aen]”“牛奶[lai]”“拿[la]来”“电[tcaen]线”“钉[tciŋ]子”“爹[tciε]”“天[tci'iaen]空”“眼[ŋiaen]睛”“额[ŋaen]头”“言[ŋiaen]传”“脸[ŋiaen]”“几毛钱[t'iaen]”“说话[fA]”“来不及[ti]”“赶集[tɕ'i]”等等。此外,部分声母[ʃ]读作[s]也较多存在于原方言和现方言中,如:“老师”“谁”“啥”“事儿”等。声调方面,西吉人搬迁到红寺堡后,常把普通话三声读成四声,如“打[tA51]”“别[pie51]”,而同心话恰恰四声比较多,这从侧面反映了红寺堡同心话对西吉话的影响。

此外,文白异读方面也体现出语言之间的相互影响,白读如:“暖[læn]和”“客(回族[k'a]、汉族[k'e])人”“避[p'i]免”“麻雀[tɕ'io]”“拍[p'ia]手”“麦[mia]子”“巷[haŋ]子”“白[pia]”“百[pia]”“彩虹[tɕiaŋ]”“绿[liu]”等,接近兰银官话区的白读方式。徐通锵先生认为,文白异读是由于各种方言相互影响、互相渗透,在方言系统中形成叠置式变异,且通过语言竞争而实现语言演变。每种语言叠置着不同方言系统,说明语言内部存在方言差异,这一差异的演变方式不是语言“变化”,而是语言“竞争”,体现语言间的横向影响^{[5](378)}。中原官话语言接触中出现竞争、演变,或合并,或消亡,且随着语言接触的深入和语言变异的逐步发生,红寺堡境内的中原官话和兰银官话势必会出现强势方言和弱势方言的对立与融合。从地域来看,兰银官话占主导,中原官话不断向其靠拢,且由于心理作用,人们更乐于接受兰银官话。固原官话将渐渐出现词汇萎缩、消亡,取而代之的是,搬迁到红寺堡后出现的词汇将不断融入移民的生活中,如“总干渠”“扬黄工程”等。

总之,随着时间的推移,红寺堡区的方言将历经接触、融合、变异。从不同方言的融合可以看出,移民搬迁后,人们不断主动融入移民新区的社会文化生活,为便于彼此的沟通交流,移民主动摒弃自己方言中晦涩难懂的词汇,学习新的方言语汇,因此,红寺堡移民区回族方言并未出现语言排斥、对立或抗拒融合的情况,折射出移居红寺堡区的各地百姓对当地语言文化的认同。而且,随着移民区内各种方言的交流、融合,必将出现新的语言特色,红寺堡也将成为移民语言接触研究、融合研究的前沿阵地,成为语言接触跟踪调查、民俗文化跟踪调查的阵地。

参考文献:

- [1] 吴忠市红寺堡区统计局. 红寺堡区国民经济和社会事业发展统计情况手册(2009~2013)[Z]. 内部资料,2014.
- [2] 张安生. 宁夏境内的兰银官话和中原官话[J]. 方言,2008(3).
- [3] 刘晨红. 红寺堡回族中学生语言情况调查研究[J]. 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4).
- [4] 赵红芳. 固原方言中回族亲属称谓的特点[J]. 语文建设,2013(11).
- [5] 徐通锵. 历史语言学[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责任编辑 李小凤】